

中国少数民族

哲学思想史论集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编

ZHONGGUO SHAO SHU MIN
ZU ZI XUE XIANG SHI
LUN JI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生平

责任校对：李小冰

封面设计：王彦革

版式设计：钱 锋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

ZHONGGUO SHAOSHU MINZU ZHIXUE

SIXIANG SHI LUNJI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11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统一书号：2190·111 定价：1.65元

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出版之际，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再接再厉，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为民族的团结与进步，为祖国的繁荣与富强，做出新贡献。

包尔汉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序

任继愈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全国各族人民都得到了新生，我们的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可以说是十分兴旺发达。美中不足的是对少数民族的哲学史研究得很不够，它不能如实地反映我国各民族的哲学史现状，显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不够充实。

中国哲学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认识史，民族有大小，各族人口有多有少，但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过去的华夏族，是中原地区众多兄弟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汉民族也是秦汉以后，经历了若干世代众多兄弟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我国民族在历史上有多次大的融合。殷周时期为第一次大融合，当时主要是东方、西方各民族的大融合。秦汉时期为第二次大融合，隋唐时期为第三次大融合，宋元明清为第四次大融合。由殷周上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已经说不出是汉族的前身还是其它兄弟民族的前身，应当是黄河流域各族共同创造的。我国古代习惯地列为汉族的一些哲学家、文学家，实际上他是否属于汉族，大成问题，比如屈原，他是楚贵族，至少他不是汉族的前身。楚人老子，虽说当过周朝的史官，他是不是汉族的前身，也难说，从他的思想表现看，他更富有荆楚文化的特征，与当时的中原文化格格不入。

• 1 •

总之，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它还在不断发展中。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多民族共同的创造，它也在不断发展中。历唐宋元明清，千余年间，各民族都一直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继续前进，都有贡献。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掌权的是剥削阶级贵族，人民群众不能当家作主，过去的历史上，民族之间也有矛盾，也有暂时的不和。但民族之间的关系，正象大家庭兄弟之间的关系，虽有矛盾，不难解决。人民群众的愿望代表着“天心”。民族之间，融合、和解、经济交换、文化交流，是客观需要，是历史的潮流，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中国的音乐史、舞蹈史、建筑史，都表明民族之间的互相吸收，取长补短是它的总趋势。仅以乐器论，胡琴、琵琶、箜篌、七弦琴、羯鼓、唢呐，又有谁可以说只属某一个民族专有、专用的乐器，别的民族不许染指呢？本民族的音乐、艺术又有多少不是为众多民族共同欣赏赞美的呢？

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各民族之间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现在没有剥削阶级从中制造不和，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呈现了民族大团结。过去各民族间互相学习的好传统在继续发扬，过去的剥削阶级制造的不和的因素已不复存在。在党的正确民族政策指引下，各民族的文化繁荣昌盛，学术兴旺发达，为前所未有的。

这一本文集的出版，就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具体证明。

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看到少数民族哲学论文集的出版，心中的兴奋自不待言。我相信只要我们从各民族发掘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无疑地会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各民族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况不尽相同，前进的步伐也不尽

一致，这是社会发展史上正常的现象。这些不同的哲学思想反映了各民族的时代思潮。对各民族的哲学思想研究得越彻底，思想资料掌握得越丰富，将来我们写出的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就越充实，从而做到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各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中国哲学史添砖加瓦，也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做出了贡献。

由于我们的科研工作进行得不平衡，这次的论文集搜集的文章还不能说很周全，论文的写作水平也不平衡。“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也是很自然的，何况我们这一工作还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呢！万事开头难。我们的工作经验还有待于积累，我们写作队伍，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写作队伍正在发展、成长中。瞻望前途，光明无限。愿与同志们共勉。

1933年5月

目 录

序.....	任继愈 (1)
重视资料工作.....	黄静涛 (1)
——我的一点希望	
试论成吉思汗天力论及其特点.....	佟德富 (7)
忽必烈的“变通”思想浅析.....	巴 干 (24)
尹湛纳希哲学思想概述.....	布和巴雅尔 (37)
试论罗卜桑却丹的哲学思想.....	武国骥 李凤鸣 (49)
《蒙古秘史》的哲学思想.....	郝宜今 (61)
《周易原旨》一书的哲学思想.....	陈少彤 (72)
简论《蒙古源流》的神学唯心主义.....	肖万源 默明哲 (84)
《黄史》哲学思想探讨.....	乌兰察夫 (99)
略论维吾尔著名的思想家、诗人玉素甫·	
哈斯·哈吉甫的哲学思想.....	买买提明·玉素甫 (108)
维吾尔哲学思想史研究大纲	阿马努拉 (120)
试谈维吾尔的古代哲学思想	杜绍源 (128)
略论鸠摩罗什佛教思想及其在我国佛学史	
上的地位	许抗生 (142)
论康熙的理学思想	宋德宣 (157)
简述康熙的哲学思想	邢玉林 (183)

伊斯兰教义哲学与儒家传统思想的显著

结合 余振贵 (193)

——试论回族汉文译著《正教真诠》的特点

回族哲学思想初探 石倬英 (204)

东乡族社会政治思想的初步探讨 王步贵 (217)

《宇宙人文论》哲学思想初探 田光辉 (231)

彝族史诗《查姆》中的哲学思想 李国文 (248)

试析苗族古代哲学思想 雷安平 潘定淑 (263)

西藏佛教密宗概述 李冀诚 (271)

编后记 (294)

重视资料工作

——我的一点希望

黄 静 涛 (蒙古族)

1981年8月，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学会。去年7月，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举行了第一届年会，进行了学术讨论。1983年8月将正式成立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这部论文集主要收集了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两次会议上的一部分文章。文章的作者分属多个民族，讨论的问题也不囿于一隅，各见其见，各是其是。借助这些文章，人们可以略见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探讨者们的工作动向和在这一学术领域里所获得的成就，并且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是我们伟大祖国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学术与文化的实践中，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工作者正在做出应有的贡献，对他们的工作，我们责无旁贷地应予以支持。

据我所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这一课题，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在学术界⁽¹⁾首先是少数民族的哲学界开始提出与研究了。但是，真正有计划有组织地、广泛地开展研究，主要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正是三中全会纠正

“左”的错误，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也正是在三中全会的指导下，各地和各方面涌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闯出新路子、开创新局面的生动景象。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的重新开展，正是这种景象中的生动事例之一。完全可以确信，在党和国家的正确路线与政策指引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只要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并积极参加有关理论问题的讨论，随着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这一学科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多的成果。

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并把文化建设列为这一建设的重要部分。这里的文化建设不光是指当代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的发展，而且也应当包括对文化遗产的整理。我们国家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就把“整理出版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规定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项目之一。毫无疑问，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并且它本身也不免具有这种遗产整理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民主主义的和进步性的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地要产生民主主义的和进步的思想。整理这些文化遗产，不但有益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也会在提高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和共产主义信念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国少数民族无论是蒙古语族、还是突厥语族和通古斯语族及南方诸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几个民族还曾建立过强大的“行国”与“居国”；它们都与周围的民族或国家有过交往；许多民族都曾在创造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同时，吸收族外的有用的文化，并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记录下来而成为一种具有特色的精神遗产。当然，在阶级社会里，在旧时代，这些遗产并不都为人民所占有，而且由于社会制度的不良及不断的天灾人祸，这些遗产往往沦于被散佚、被破损与被埋没的命运，然而正如破损屡屡一样，创作与积累也是屡屡的。事实证明：我国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的不能谓之甚少，相反，就某些方面说却是很多，只是并不都为人们所熟悉。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各地的学术工作者也的确在搜集、保存与整理工作上，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绩，这对于学术研究、首先是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无疑极大地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园地。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并更加扩充这些有利的条件，推动与组织学者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对这些资料从更深、更广的方面去下功夫研究。

亦如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那样，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也必须以资料、首先是文字记录资料为前提。一般原则从来不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它只是对资料进行研究的最后结果。因此，尽可能充分地占有资料，始终应当是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者的起码要求。只有占据与整理了有关的资料之后，才谈得到研究，才谈得到马克思所说的使资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的可能。

由于各种历史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不光多有散失和残损，而且也象汉族的古代文献资料一样，历史、文学和哲学多不“分家”，一书兼备几种学科、几多学问集于一文的例证，往往而有。根据学科予以分门别类，固然有其难处，而历来的学者们也从来很少有人去进行扒梳、归类、编纂等的工作。据我看，这是一项亟需从头做起加以补充的漏洞。为了更方便地提供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资料，在整理出版有关的专著的同时，从哲学史专业的角度出发，编纂“类书”，似乎不是不必要的。

一般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由于过去没有印刷条件或印刷条件不良以及长期辗转抄录，也有不少脱文、衍文、倒文和外错的地方；对于这些资料也有校勘、辨误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哲学史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可能的。我们过去间或也曾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很不够，并且似乎也缺乏计划性与选择性，因此，人们每每感到，有些较重要的著述，至今尚没有整理出应有的范本。这是需要今后认真对待的。

资料的翻译工作，也需要加强。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学者们的著作，往往有散见于别族文字中者。这可能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大概原来就用别族文字撰述，本族文字的著录中反而没有他们的名字；另一种是一些著作很早以前就被译成别族文字，并颇通行在别族的学坛上，而原文本却反而不那么显著，并且也不为本民族的研究者所通悉。从学术研究的需要说，这些显然是一个缺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学者们需要向这方面花点力气。没有译本的当然需制出规划，力争译出本族文字的译本，即使

已有了译本的，也恐怕要重新精译。我就看到旧的译本中是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的，如不立译例、前后矛盾、附会猜测、歪曲原意、语意不明等等，每每而见。依据这样的译本，怎么能够扎实地研究？当然，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仅仅依靠哲学史工作者是不行的，这需要与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学、文字学、宗教学的同志们一道通力合作。

列宁认为：哲学史就是一般认识的历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应当就是中国少数民族一般认识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史也应当是一部悠久的历史，至少与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首先是阶级斗争史一样长久。然而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被当作专业、当作科学形态去对待。作为一项科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实际上是一个新的项目。它既无前人研究的基础作依靠，又无现成的科学成果以资参考，也无整套的新经验可吸取，一切都在刚刚起步，一切均需首创。较诸我国少数民族的其它学科研究，哲学及社会思想史更是处在发展变化中。它的完整的科学化建设尚须做出多方面的努力。它有很多问题需要逐步探索。它的范畴与一些概念，它的类型，它的特点，它的历史分期，它的方法论以及它与各族哲学史的关系等问题，都还处在初级的探讨阶段，都还需要花大力气。然而我愿意在这里特别地多说几句关于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资料方面的话，无非是感到这一前提的迫切性。朱熹说：“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个土窟子，谓水专在此。”说资料的先决性，决不是说，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全部只限这个“土窟子”，但是不了解这个“土窟子”，不在这个方面付出功夫，所谓“大江大河”何可深涉？

赵紫阳同志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

“在大力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重视发展社会科学，……要填补空白学科，加强薄弱学科。”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在我国的哲学及社会思想史中属于薄弱环节，确实需要迅速地、大力加强之，而资料工作尤需加强。从长远看，从这一阶段为下一阶段创造条件、奠定基础这个设想看，把这一工作做好，我想是必不可少的。

试论成吉思汗天力论及其特点

佟 德 富（蒙古族）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出身的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他虽然没给后世留下什么专门的政治、军事或哲学著作，但是，从有关的历史记载中不难发现，在成吉思汗一生的言行中，贯穿和体现着一种“长生天”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哲学上我们把它称作“天力论”。本文试图就其“天力论”的内容及特点作一初步探讨，以求得前辈和同志们的指教。

—

成吉思汗的时代（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是蒙古族社会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传统的“长生天”思想在蒙古族社会居统治地位。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再加上连年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人们对天灾人祸得不到正确认识 and 科学的说明，于是就把一切恐惧^①、不安和不解之谜，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统统寄托在神秘的天意上。在日常生活和重大活动中，人们总是要向“长生天”祈祷，以求“永恒的青天”佑护。这在《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和其他许多史籍中，都

有很多记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秘史》中记载的大小战争，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以及各类人物的举止言谈等，无一不和“长生天”联系在一起。因此，传统的“长生天”思想在当时十分盛行，天和天意几乎成了人们解释一切现象的最高原则。

（一）天是创造万物的最高神

在《秘史》和其他著述里，把天看成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由有意志的“长生天”安排的，比如说，野兽是“遵天地之命所生”^①的，人的机体和生命是“奉天之命，父母所生之肌肤”^②。“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的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怎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着。无一事不归于天。”^③这样，“长生天”不仅是万物的创造主，能知人间之吉凶祸福，定万物之生死寿夭，且是全智全能的最高神。这种种说法，就是对蒙古族社会敬天思想的真实写照。

（二）成吉思汗是“神的使者”

成吉思汗顺应历史潮流，合乎民意，统一了蒙古各部，完成了蒙古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的变革，从而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蒙古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因此，他自然也就成了当时蒙古族人民心目中的神——“长生天”派到人间的代表，是授命于天的“天子”。

为了说明成吉思汗是受命于天的“神的使者”，首先就把他的祖先说成是受天的委托，代表天意降生到人间的。

①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42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以下简称《简注秘史》）。

② 同上书，第202页。

③ 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黎照庐丛书》。